

《黄帝内经》考证与研究丛书

HUANG DI NEI JING SHU MING YU CHENG SHU NIAN DAI KAO ZHENG

《黄帝内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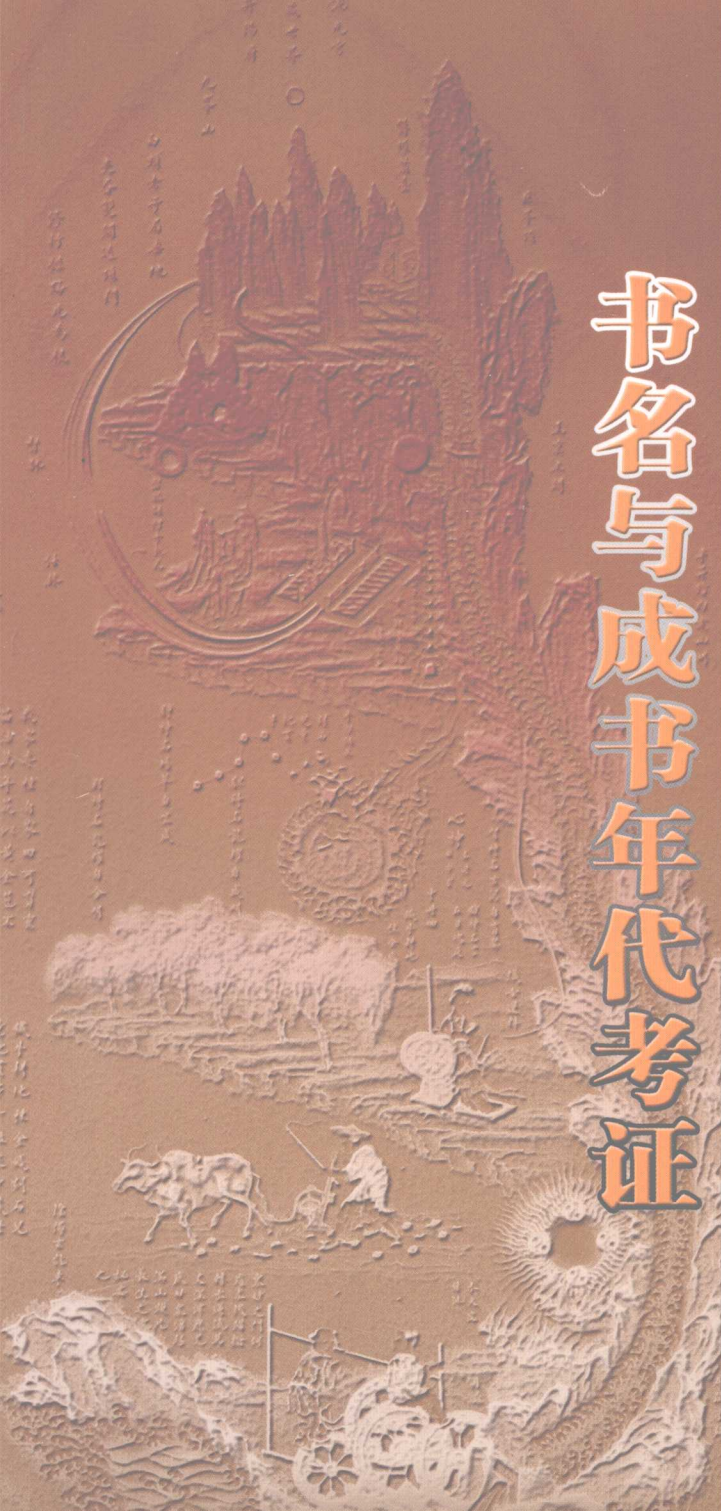
周海平

申洪砚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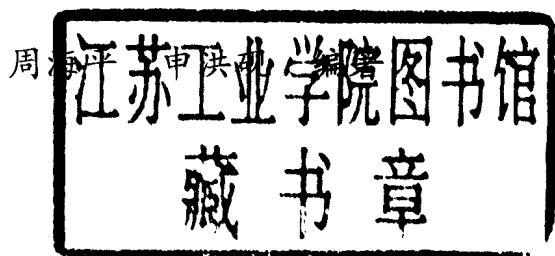
中国古籍出版社

书名与成书年代考证



《黄帝内经》

书名与成书年代考证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帝内经》书名与成书年代考证/周海平, 申洪砚编著.
-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9. 2
(《黄帝内经》考证与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80174 - 666 - 5
I. 黄… II. ①周…②申… III. 内经 - 研究 IV. R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4306 号

《黄帝内经》书名与成书年代考证

编 著 周海平 申洪砚

责任编辑 郝恩恩

装帧设计 韩博珩

出版发行 中医古籍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100700)

印 刷 北京金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0001 ~ 2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174 - 666 - 5

定 价 15.00 元

前 言

自《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以来，后人一直宗之为医经之祖。惜《汉书》后，并未见其书传世。于是，《甲乙经·序》指认《针经》《素问》为《内经》。至唐代王冰，则认为《素问》《灵枢》为《内经》。王冰之说一直沿续至今。其实，《内经》在《素问》问世之前，并未亡佚，只不过是离析分散于其他医书之中罢了。今天所见到的《难经》和《素问》，就有一些《内经》散在的文句，留下了《内经》存在的痕迹。

《内经》《素问》《灵枢》，本不是一书，而且其成书年代也各不相同。但是王冰之说，一千多年来已被医界所公认，所以现在学习和研究《内经》，均以《素问》和《灵枢》为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内经》之原书，早已亡佚。现在的《素问》与《灵枢》，又同属较早的医理类的“经书”之例，将其归属为《内经》，也在情理之中。本书探讨《内经》《难经》《甲乙经》《素问》《灵枢》的源流、成书年代、版本衍化、书名含义等问题，是从史学的角度，去探求其原貌或根源，以期对学习、研究《内经》有所裨益。

《内经》原名并不叫《内经》，所以用“内科、外科”之“内”，或是用“内篇、外篇”之“内”，均解不通其书名含义。《灵枢》追溯其源，却和《甲乙经》有着密切的联系。《灵枢》的前身是《九卷》，而《九卷》是《甲乙经》的变异本。由此，

《灵枢》同样也可视为《甲乙经》的变异本。

与《灵枢》和《甲乙经》的关系不同,《素问》和《内经》,并无本质上的必然联系。《素问》既不是《内经》的别本,又不是《内经》的解释、发挥篇。《素问》和《内经》是两本各自独立的书。《内经》是一部诊断学专书,而《素问》则是一部综合性的医学基础理论问答之书。《素问》以问答体例成书,在这一点上它是受《难经》之影响的,并不是受《内经》之影响的。况且《内经》原书,并不一定是问答体例的书,至少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黄帝”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名。古人为了增加某些书的可信度及威望,常将书名冠以“黄帝”之称,尤以医书为最。医书由冠名黄帝,一直发展到了视“黄帝”为“医学”的代名词。这种情况,从汉代一直到隋唐,久行不衰。如将医学称为“黄帝医经”、“黄帝术”等即是。犹如今天常说的“岐黄之学”一样,均为医学之代名词。

辨识了“黄帝”既可指书名,又可代称医学这一点后,《黄帝内经》和《黄帝素问》书名的含义,就昭然清楚了。前者为一书名,后者“黄帝素(术)”,代称医学,并非指“《内经》”之书名。《素问》之初,并未加“内经”二字,只云“《素问》”或“《黄帝素问》”。宋以后,多有将此二者概念混淆者。于是,凡录《素问》之名,多在其前加以“内经”二字。致使《素问》和《内经》的关系,混浊不清,易使人产生误解。

由于史书对于《内经》《素问》《灵枢》等书的载录,沿袭旧说的多,详加考证者少,且不乏传闻不实之说。重复、讹误之处不在少例。医籍中《内经》等书年代之说,也多臆断推测,

人云我云，未有定论。详实明晰的医史之书，显然贫乏，这对于考证《内经》诸书的成书年代，无疑是难度大增。

我们的考证手段，立足于从现存的《难经》《甲乙经》《素问》《太素》《灵枢》等诸书原文中，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发现问题，证实问题，再参合史书医籍诸说，最后得出结论。历经二十多年的资料积累，执笔数载，总算小有结果，也算是一斑之见吧。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书中错、失之处，必然存在，诚盼同道及读者指正。

申洪砚

2008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内经》原名《诊经》	(1)
第一节 《诊经》出现的年代	(1)
第二节 《诊经》音转为《内经》	(5)
第三节 《诊经》的现存痕迹	(10)
一、《诊经》书名的现存痕迹	(10)
二、《史记》中《诊经》的痕迹	(11)
三、《素问》中《诊经》篇名的痕迹	(14)
四、《难经》中《诊经》内容的痕迹	(16)
五、《素问》中《诊经》内容的痕迹	(23)
第四节 《内经》(《诊经》)的传本	(37)
第二章 《难经》成书于《内经》之后《素问》之前 ..	(42)
第一节 《难经》成书于东汉	(42)
东汉时的医学词汇	(42)
第二节 《难经》早于《素问》	(61)
第三节 《难经》的作者不是秦越人	(75)
第三章 《甲乙经》早于《素问》	(81)
第一节 《甲乙经》原貌初探	(81)
一、《甲乙经》初本的卷数	(81)
二、《甲乙经》初本的篇章内容	(85)
三、俞穴部分	(94)

第二节 《甲乙经》早于《素问》	(98)
一、《甲乙经》受《难经》体例的影响	(98)
二、《素问》与《甲乙经》相关内容的比较	(104)
第三节 《甲乙经》的成书年代	(115)
第四节 《甲乙经》的作者不是皇甫谧	(120)
一、皇甫谧的生卒年代，与《甲乙经》的成书年代不合	(121)
二、《晋书·皇甫谧传》中并未说皇甫谧著有《甲乙经》 之书	(121)
三、皇甫谧是文史学家而不是医学家	(122)
第四章 《素问》成书于490年左右	(124)
第一节 《素问》的成书年代	(124)
一、从语法关系看《素问》的成书年代	(124)
二、从词汇看《素问》的成书年代	(129)
三、二序之说不可靠	(139)
四、《素问》成书于490年左右	(147)
五、《素问》的增补完善	(152)
六、《素问》的传本	(164)
第二节 全元起是《素问》的作者	(171)
一、从《太素》看全元起是《素问》的作者	(171)
二、从王冰注本看全元起是《素问》的作者	(175)
三、从《新校正》看全元起是《素问》的作者	(179)
四、从史料记载看全元起是《素问》的作者	(186)
五、从方言看全元起是《素问》的作者	(192)
第三节 《素问》的名义	(198)

一、《素问》与《内经》并不是一本书	(198)
二、全元起之书原名《黄帝素问》	(200)
三、《素问》的名义	(201)
第五章 《灵枢》的成书年代	(205)
第一节 《灵枢》是《甲乙经》的变异本	(205)
第二节 《九卷》在《素问》之后《太素》之前	(219)
第三节 《针经》在《太素》之后王冰之前	(224)
第四节 《灵枢》的成书年代及其早期版本	(228)
第五节 《灵枢》的名义	(238)

第一章 《内经》原名《诊经》

第一节 《诊经》出现的年代

陈邦贤等著《中国医学人名志》：“程高，后汉。性好经方。闻涪翁善医术，有《诊经诊脉法》，录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诊经》与《诊脉法》，互文同义。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两本书。若作为一个偏义词来看，则侧重于《诊经》。因为《诊经》的含义更宽，它可以包括《诊脉法》在内。

西汉时，脉诊已较普遍。在此之前，古人诊病，比较重视望诊。扁鹊望齐桓公之容色，即指出“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伤寒论·序》：“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难经·六十一难》：“经言望而知之，谓之神”，“望而知之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是古人崇尚望诊之例。

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载的仓公（淳于意）《诊籍》中我们知道，西汉时不仅脉诊普遍使用，而且诊脉部位以寸口为主。也就是说寸口诊脉的起源，有文字可证者，就是西汉时仓公之《诊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仓公 25 例《诊籍》中，有多处提到寸口脉诊。而且仓公每一医案，其始必先“诊其脉”。可见当时寸口诊脉之盛行。

在仓公的《诊籍》（医案）中，齐郎中令循病一案中，有“切其脉时，右口气急，脉无五藏气，右口脉大而数，数者中下热而涌”；齐王太后病一案中，有“臣意诊其脉，切其太阴之口”；齐中尉潘满如一案中有“右脉口气至紧小”；济北王侍者

韩女病一案中有“肝脉弦，出左口”。“右口”、“太阴之口”、“脉口”等，均指同一诊脉部位，即今天之“寸口”诊脉部位。可见仓公之时，也就是西汉之时，寸口诊脉法已较普及。

由于寸口脉诊脉法较其他的诊脉法，如上下（人迎、趺阳）诊脉法等方便而实用，所以这种诊脉法容易推广普及。也正是有了这种方便实用的诊脉法，古人对于脉学的研究（整理、归类、创新等）才有了量和质的发展。在仓公的《诊籍》中，已经出现了多种脉象，如：长而弦、代、数、盛、急、少、衰、阴、沉而坚大、浮而大紧、大而躁、乍躁乍代、深小弱、三阴俱搏、紧小、大而实、啬而不属（注）、肝脉弦等。

汉时的《诊经》，虽然早已亡佚，但是我们从它现存于同类书的痕迹中可以推知，《诊经》的主要内容，以望诊、脉诊为主，同时也有辨病的内容。《素问·移精变气论》：“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上古使飧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由于《诊经》中“脉诊”的内容较多，所以古人连称作“诊经诊脉法”。

战国前的古书，常有一书多名的情况，也多有篇无名的情况。也就是说书名的称谓较随便。如《战国策》或叫《国事》，或叫《短长》，或叫《事语》，或叫《长书》《修书》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诗经》原无书名，经孔子整理后定名。《尔雅》本为周秦旧文辑录，至西汉末始定书名。这种情况，战国后也有延续，尤其是医书，无书名、一书多名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汉墓出土（公元前168年）之古帛书《老子》《战国策》《医经》等均无书名。《难经》，《隋书·经籍志》初载时并无作者，至《旧唐书·经籍志》却说它为“秦越人撰”。《针灸甲乙经》又名《黄帝三部针经》《黄帝三部针灸经》《黄帝甲乙经》《甲乙经》等。这就可以理解《诊经诊脉法》就是《诊经》一书而不是两书的书名了。

《后汉书·方术列传》：“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

这里“针经”之“针”字，当为“诊”之音转。《针经》即《诊经》。为什么？其一，汉以前医经、医方、本草、脉书、针灸之书等，是分别立著的，并不杂合在一起综合为说。这可以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得到佐证。《方技略》中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剂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痛为剧，以生为死。”“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经方与医经，泾渭分明。汉前针灸之书与诊病之书，是分别而论，并不参杂的。所以《针经》与《诊脉法》合并在一起是违逆当时体例的。而《诊经》《诊脉法》则是义例相合。

其二，西汉以前以灸法为主。因为当时冶铁技术尚不发达，制造不出较精致的金属针具，所以限制了针刺技术的应用与发展。西汉前的针刺，多用砭石，即石针。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救治虢太子一案，以药熨法急救为主：“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至西汉之仓公（淳于意）仍多用灸法。如仓公治螭齿“灸其左大阳明脉”，治气疝“灸其足厥阴之脉”（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马王堆汉墓（前168年）出土之《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只用灸法。《左传》载秦医缓治晋景公之病时说：“攻之不可，达之不及。”“攻”即灸法。至汉《伤寒论》时仍有“可火”、“火攻”等灸法应用。

西汉中晚期，熟铁冶制技术及炒钢新技术才出现（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此时才有可能出现精制金属针具。在西汉末至东汉初这样短的时间内，针刺技术的积累和发展，不可能产生《针经》这样的专业针刺书籍。况且《后汉书·方术列传》说涪翁用的是“针石”，也就是说仍沿用砭石来刺病。《汉书·艺文志》“针石汤火所施”注：“针，所以刺病也；石谓砭石，即石针也。”《山海经·东山经》“其下多针石”，郭璞注：“针石，可以为砭（砭）针治痈肿者。”《素问·宝命全形论》王冰注：“古者以砭石为针”。又《素问·血气形志篇》注：“石，谓石针，则砭石也。”《战国策·秦策》吴师道注：“石针曰砭，所以刺病。”由此可知，“针”、“石”互文同义，均指砭石。石针比较粗糙，不如金属针具那样能够准确地针刺穴位。所以“针石”时代，不具备产生以刺疗穴位为主的《针经》。

《后汉书·方术列传》说《诊经》（《针经》）的作者是涪翁。这一观点笔者不能认同。涪翁的年代约为公元20~80年。而早此之前的公元前180年（汉高后八年），淳于意就从他的老师公乘阳庆那里获得了诊书——《五色诊病》。公乘阳庆为公元前250~176年（《中国医史年表》）。那时已有专业诊书出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又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古今医统》《太平御览》等载，淳于意从公乘阳庆那里获得《五色诊病》后，又传授给多人，如汉人宋邑从淳于意学“《五诊》《脉论》之术”，为当世良医；汉人杜信从淳于意学“《上下经脉》《五诊》之法”。另外还有唐安、高期、冯信等人。公乘阳庆不但授医术于淳于意，还传授

给了杨中清。这说明诊病之书，即《诊书》，已在公乘阳庆、仓公学派中广为流传。

前面说过，战国时及西汉初，古人对书名的称谓多较随便，一书往往多称。仅此《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一篇，便出现了《五色诊病》《五诊》二名。诊病之书笼统称为《诊书》，自在情理之中。而《诊经》之“经”字，在当时只不过是“书”之含义。《诊经》即《诊书》，《诊书》古人就叫做《诊经》。《淮南子·本经》高诱注：“经，书也”，《国语·吴语》韦昭注：“经，兵书也”，《礼记·王制》注：“书者，言事之经”。此“书”、“经”互文同义，古人称书为“经”。《论衡·正说》：“五经总名为书”，《史记·礼书》索隐：“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史记·正义》：“五经六籍咸谓之书。”

西汉时仓公（淳于意）学派的《五色诊病》或《五诊》，就是当时的《诊书》，也就是《诊经》，其产生流传的时间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初。

我们之所以不认为东汉初之涪翁是《诊经》的作者，还有另一个参考因素。据《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涪翁乞食人间，无固定住处，是否识字尚不可知。另外涪翁性喜清静，以道家之无为为旨，常垂钓于涪河，连名字都不向世人透露，更不会著书立说彰显其名其术。程高寻求多年，涪翁才传授给他，是其术并不轻易传人，自然不去著书泄露其术。所以我们分析涪翁上受师传，口述传给程高的可能性较大，即涪翁曾得到先师《诊经》的口授，他又口述传授给了程高。

第二节 《诊经》音转为《内经》

《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关于为什么叫《内经》和《外经》，日·丹波元胤在《医

籍考》中说：“内外，犹《易》内外卦及《春秋》内外传、《庄子》内外篇、《韩非》内外诸说，以次第名焉者，不必有深意。‘内’字，诸家有说，不可从也。”丹波元胤氏所说的《易经》内外卦，不过是上下篇一类的含义。《左传·僖公十五年》杜预注：“筮卦之画从下而始，故以下为内，上为外”，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筮卦以下始，故近为内卦，远为外卦。”把《内经》和《外经》，解成黄帝医书之上篇和下篇，这显然不妥。因为自《汉书》载录“《黄帝外经》”以来，从来也没有人见到过《黄帝外经》，也就是说，只见《内经》，不见《外经》。如果一本书只有上篇，而下篇始终不存在，是难以说通的。

丹波元胤氏说“以次第名焉者，不必有深意”。这就是说，《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可以看作是黄帝医书的第一种、第二种之义，没有什么过深的含义。《韩非子·内篇》陆德明释文：“内者，对外立名。”内篇与外篇，相互对举而言，无非也是上、下篇之义。《易·系辞》李鼎祚集解：“内，初。”《战国策·韩策》鲍彪注：“外，犹后也。”这里的“内”、“外”，有先、后之义，亦即一、二之义。但是这种先后、一二次序之说，也难以解释《内经》《外经》的确切含义。因为两书没有对比，所以谈不上先后、一二。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刘向于《素问》之外，复得黄帝医经若干篇，于是别其纯驳，以其纯者合《素问》，编之为《内经》十八卷，其余则为《外经》三十七卷，以存一家之言。”又“刘、班于一人所著，同为一家之学者，则为之定著同一之书名，如《淮南内、外》是也。”照余氏的说法，《黄帝外经》是《黄帝内经》的补充篇。如此则“内”有“原书”之义，“外”有“增补”之义。余氏的后一种说法，与丹波元胤氏犹“《春秋》内外传”一例说法相同。关于《春秋》之“传”，我们现在只知道现存的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至

于这三传怎么成了“内外传”，我们则不得而知了。但按其所举例义，是让我们理解成《黄帝内经》，虽然作者不同，但同为黄帝医书之类，所以用“内”、“外”来命名其书，以示经同，立说却有异。

我们同样要否定这一观点。西汉前的古医书，类别分明，不综合论述。如医经、医方、本草、经脉之书，都是独立为著。如果简单地用内、外二字来概括分别，失其古例。如同为医理之说，外内主次另立书之说拟无必要。

《汉书·艺文志》图书目录之蓝本，为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父子所著的目录学书《七略》。余嘉锡、龙伯坚、高文铸等均认为《黄帝内经》之书名为刘向、刘歆父子编撰《七略》时所定。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刘向于《素问》之外，复得黄帝医经若干篇，于是别其纯驳，以其纯者合《素问》编之为《内经》十八卷”；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说》：“这表明在刘歆时代，即公元前一世纪的末年，已有《黄帝内经》这一名称。在刘歆以前有没有《黄帝内经》这一名称呢？《史记·扁鹊传》说：‘长桑君……乃悉取其禁方书与扁鹊’。可见公元前五世纪上半期扁鹊时代，只有禁方书的笼统名称，不仅没有《内经》这一名称，并且医书和黄帝也还没有发生关系”；高文铸《黄帝内经书目汇考》：“刘向整理国家图书之前，或许没有《内经》之名，其内容均以单篇形式流传。逮刘向等编目时，把有关黄帝、岐伯论医的内容合为二佚，一曰《黄帝内经》，一曰《黄帝外经》。”

《黄帝内经》书名出于刘向、刘歆之时，这一观点我们基本上赞同。但是我们要提出三种新观点：①《黄帝内经》之“内”字，为“诊”字之音转。《黄帝内经》，即《黄帝诊经》。②《黄帝外经》之“外”字，为“脉”字之音转。《黄帝外经》即《黄帝脉经》。③《内经》（即《诊经》）之内容，原本并无黄帝、岐伯问答之体例。其问答体例，为其后之书《素问》之

编撰体例。下面分别论述。

刘向、刘歆生活的年代，为公元前 77 年至公元 23 年。他们在编撰图书目录、辑录医书时，必然选择在当时较为普及、流行的医学著作，而且确有其书，方才著录。所以我们说《黄帝内经》《黄帝外经》，在刘向、刘歆时确有其书，只不过是书名不同罢了。关于这一点，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不知向、歆校书，合中外之本以相补，除重复定著为若干篇（其事无异为古人编次丛书全集），著之《七略》《别录》，其篇卷之多寡，次序之先后，皆出重定，已与通行之本不同，故不可以原书之名名之。”这就是说，刘向、刘歆搜录书籍所定之书名，多与原书不同。

从西汉初年公乘阳庆之时起，至其徒弟淳于意及其门生宋邑、杜信、唐安、高期、冯信等人时，《诊书》《脉书》就已经开始传播普及（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至刘向、刘歆时，淳于意（仓公）学派的《诊书》《脉书》等，已经流传了一百多年，在当时的社会及医界中，已算是名著了，所以才会被刘向、刘歆采录。

“诊”与“内”，“脉”与“外”，均音近易转。刘向前没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之书名，只有《诊书》《脉书》之医书。不管是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音转，还是刘向、刘歆整理医书时导致的音转，我们见到的《黄帝内经》《黄帝外经》的文字记载，只能追溯到刘向、刘歆的《七略》了。

西汉时代，又是一个崇尚黄帝的时代，医书冠以“黄帝”之名，更是普遍现象。《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刘向《列子新书目》说：“孝景黄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淮南子》为公元前 122 年之书，汉景帝公元前 156 ~ 140 年执政。此时正是仓公学派推行传播《诊书》《脉书》之时代，将其书冠以